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25

THE FIFTY-YEAR WOUND

五十年伤痕 上

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 著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郭学堂 倪世雄 审校



上海三联书店



五十年伤痕

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 著 郭学堂 潘忠岐 孙小林 译
郭学堂 倪世雄 审校

THE FIFTY-YEAR WOUND



上海三联书店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中文版序言(一)

在中国朋友的慷慨帮助下,这本书翻译出版了中文版本。本书考察了1945年至2002年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二战结束开始,到纽约和华盛顿发生“9·11”突然袭击结束。本书最先出版于这次恐怖暴行发生半年之后,并成了畅销书,部分原因在于我试图从大冷战冲突时期美国领导人的对与错中寻找教训,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也仅仅发生在世贸中心倒塌和五角大楼遭到破坏10年之前。我的目的也是为了判断美国在冷战几十年中是怎样处理世界事务的,这可以为应对“9·11”事件后出现的挑战提供一些借鉴。

当前,许多美国人倾向于将“后9·11世界”(post-9/11 world)看成是一个全新的和充满特殊危险的时期。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看法的有力佐证之一:在华盛顿有人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可能正好拥有化学、生物甚至核武器,如果有一点点机会,它就可能而且愿意将其转移到基地组织的手中,美国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猜测长期存在的侯赛因独裁政权与宗教狂热分子可能分享这种武器,比中央情报局(CIA)盲目认为这些武器已经存在甚至还要荒谬。但是,伊拉克战争的背景表明,美国人已经相信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与2001年9月10日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同,对他们来说,在9月的那个晴朗的星期二早上,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大西洋沿岸诞生了。

但是,这个世界当然没有什么不同和改变,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来自恐怖主义的激烈攻击形式,比如劫机、具有高度杀人动机的秘密组织。如果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欧洲

和中东的恐怖暴力活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恐怖行动以前就发生过。“9·11”暴行并不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黑暗一面:杀人者没有固定的国家,他们借助世界各地匿名转入的资金混入美国本土达一年之久,而且这种恐怖场景又可以通过电视在最大程度上传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相反,2001年9月10日与9月12日的区别是很小的。技术和科学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工业、医药、学科领域的革命进程。就在这一年,纽约证券市场将清理世贸中心遗址的新闻放在了一边,并从因特网和通讯泡沫的爆裂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崩溃中恢复过来。这次恐怖暴行更没有影响到新世纪最大的世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全面发展。

在大约40年(1950年至1991年)中,美国人的生活一直伴随着这样的事实:面对苏联的核打击,大部分人会在数小时内灰飞烟灭。由于执行了“遏制”政策,他们已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失去了10万人的生命。世界上所有的恐怖分子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不可能做到苏联帝国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与通常情况更加不同的是,现在美国的外交决策中却鲜有这样的观点。

我们怎样了解现在的处境

我相信,从那些最终迫使锤子与镰刀的旗子于1991年12月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的事件中,中国领导人和美国人一样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一场跨越全球、持续数十年的冲突(不管是叫做“冷战”还是真正血腥的“热战”)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是一场斗争。这段既非战争又非和平、影响遍及全球的时代还有其他许多方方面面,它远远超出了美苏对抗。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二战结束时中国被看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支持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1950年冷战转为“热战”时又成了美国的直接敌人;在70年代中美结束对抗,建立了外交关系。

了解现在的美国就需要了解美国历史上这些千变万化的岁月，去认识它们怎样塑造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创新，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如何定位的感觉。实际上，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与了解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于1945年以来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如何交往同样重要。所有这类研究都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当今事件的视角。

现在的世界正处在令人着迷的交接点。美国或者中国都没有倒退，企业精神、经济活力，甚至更加乐于融入世界贸易和信息革命的愿望都在推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向前发展。除了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外，还有很多东西在引导着它们。但是，谁能告诉我们未来不属于正在蹒跚前进的俄罗斯？尽管中国和美国都在各自攀登更高的山峰，建设一个更加合作和更加富足的世界，但是我们并不能说美国人已经很了解中国，或者也不能说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使中国（或者更加熟悉的欧洲国家）最老练的学者易于掌握美国在亚洲或中东地区的国际行为的方向。在这些国际行为中有许多都是过去的产物。

苏联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美国长期以来就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他们中间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肯定都是巨大的，每一个国家都曾为击败邪恶的侵略者——在西方的纳粹德国及其法西斯盟友意大利，在东方的日本帝国——而战斗过，其中日本在中国犯下的世界级大屠杀罪行与纳粹德国别无二致，而这一事实目前在欧洲和美国都被轻易地忘记了。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三个盟国曾经为抗击共同的敌人而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合作。

现在看来，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初的对华政策十分幼稚。1946年美国总统派遣了一个外交代表团到中国，要调解毛泽东和蒋介石两种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了主宰中国的未来，这两种国内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竞争。美国有一种善意，要带领他们走到一起，但是，美国的这种理念由于忽视了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而显得十分危险。当国民党于1949年被共产党击败时，美国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最为尴尬：国内政治对手高呼“谁丢失了中国？”（好像中国曾经

是美国的,所以“丢失”了)这种争论肯定会激怒所有的中国人,不管他们信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美国人指责国务院内有叛国者和阴谋家,实际上,这些人是美国最坚定的职业外交官,他们只是希望在可谈判条件下至少与胜利的一方保持联系。

在那时,虽然苏联是美国最危险、最强大和最具扩张意识的敌人,但是,数十年来冷战的真正暴力发生在中国的边境——朝鲜半岛和越南。由于美国目光短浅,非要“遏制”所谓的中苏“集团”,在1950年至1953年间,美国与中国人民志愿军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战争,以至于此后20年间美中之间没有任何接触,更不用说外交接触了。现在,分裂的朝鲜半岛仍然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困扰世界的问题之一。

从朝鲜战争开始,美国又开始悲惨地滑向了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打破了民主党控制美国政治的局面,而这种深刻变化至今仍在影响美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美国在越南的挫折也一度约束了美国公众支持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干预行动的任何兴趣,更不用说60年代被误称为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了。只有到了“9·11事件”之后,所有的事情才看起来是那样的耳目一新。

未来走向何方?

你要读的这本书是我在哈佛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多年教学的成果,也来自我作为美国政府机构的顾问就国防政策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哈佛大学期间,我本人从70年代中美的再次接触中受益匪浅。大约在1979年和1980年间,我和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复旦大学的倪世雄教授——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正在访问哈佛大学,从那时起,他已经在美国学术界为人所熟知。倪世雄教授向我和我的同事介绍新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它是怎样运转的以及它可能的发展方向。他在各种专题研讨会和私人谈话中强调,在冷战最为危险的阶段,中美两国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年代,在这个年代,正好发生了阿富汗遭到入侵的事件,

苏联军队不断部署洲际弹道导弹武装部队。这也是北京有充分理由指责华盛顿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与中国也有迫切的理由尽可能多地展开合作。

由于中美紧张关系减弱到了最低状态,罗纳德·里根政府(1981—1989)才可以聚焦实施想象出来的反苏战略。这项战略由五部分组成:无论如何要切断向莫斯科的技术流入;切断西方贷款资金;在苏联外部地区展开对抗,比如在阿富汗和安哥拉;加大对苏维埃合法性的宣传攻势;最后,向莫斯科明示它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到1985年3月米切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可以这样认为,美国已经赢得了冷战的大部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除了冒险选择武力手段外,他实际上已经没有退路可寻。在最初的一年或两年中,他仍旧斗志不减,比如将阿富汗战争升级、增加苏联的生物武器弹头数量,但此后他开始明智地退却。这并不是苏联倡导的“新思维”(perestroika)结束了冷战,事实是,苏联对抗的是一个坚定、全面、并且具有很强破坏力的美国战略,在这一战略中,美国得到了其欧洲和亚洲盟友的支持。

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瓦解,这年年初盟国军队击败了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侵略,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美国30年来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最后,美国在经济和技术创新方面倾注了所有的精力,这些都是美国的真正依赖的地方。因特网奇迹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另外一个奇迹是美国对外贸易的急速发展,与中国建立起来的形式多样的新型商业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可是,美国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危险——从阿富汗废墟中释放出来并与中东无休止的危机融合起来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中东的暴力循环就是以巴危机,令人悲哀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站到了扩张中的以色列一边,丝毫不顾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这种危险是一种致命的结合,形势因此更为复杂,因为它发生在仍然对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所需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地区,更不用说欧洲盟国和中国了。

美国现在又回到了战争状态。在“9·11”袭击发生后,阿富汗

毫无疑问遭到了打击,塔利班政权及其基地组织联盟被摧毁。但是,这件事和伊拉克没有任何关系,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明白这一点。2003 年对伊拉克的侵略将 1945 年以来美国众多政治军事行动中的天真思想集于一身,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对美国希望“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一无所知。再说,伊拉克本身甚至就不是一个国家,它是英国殖民统治者于 1923 年在地图上划线的产物。

在人们必然对伊拉克战争失望之时,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这意味着美国又一次要迫不及待地耗费时间和资源发展军事力量,而不是发展经济力量。可以肯定地说,恐怖威胁将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是,它面对的是迄今更为具体和目标更为明确的战略——可能投入特种部队来实施的战略,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采取全面的军事干预行动。在小型游击行动越来越有效(装备有更加强大和精确的火力,打击距离更远)的时代,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传统军事力量也越来越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了。我们日益依赖的和塑造未来世界的已经是创造财富的和那些涉及人力资本(指的是教育、企业和技术革新以及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迫切愿望)的能力。

中国和美国都有各自强大的优势,远远超出欧洲或者俄罗斯甚至也许有些管理混乱的印度。美中两国之间自 1950 年开始和在 70 年代有所弱化的激烈竞争关系仍将继续下去。事实上,这种竞争可能比以往更加激烈,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这次竞争不会出现暴力。实际上,政治将处于次要地位,关于军事竞争的任何问题都逐渐让位于更加持久的问题,那就是国家能否创新得最快、学习得最快、享有难以超越的综合发展。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健康的东西方竞争,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竞争值得欢迎。

德瑞克·李波厄特

2007 年 11 月

中文版序言(二)

28年前,中美两国刚刚建交不久,我第一次访问哈佛大学,在那里结识了德瑞克·李波厄特博士。在我访问的那段时期,美苏冷战正酣,双方实力的消长也正处于关键状态,李波厄特称其是“冷战最为危险的阶段”。苏联在1979年入侵了阿富汗,并在亚洲和东欧地区加快部署洲际弹道导弹,苏攻美守的战略格局看似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苏联还在中国的西边和北边部署重兵,在南边支持越南不断给中国制造麻烦。在198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中,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获得了胜利,预示着冷战末期最为重要的里根时代的来临。虽然那时中美两国间在台湾问题上仍然龃龉不断,但为了消除共同的威胁,中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而建立起来的战略合作基础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扎实地发展。

冷战已经结束了将近20年,可是它似乎如幽灵一般仍然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在国际关系中阴魂不散。回忆起那段难以忘怀的岁月,我们不禁扼腕感叹:冷战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每一个研究国际问题的人都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忽视历史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

几年前,当我在华盛顿再次见到正在乔治敦大学从事政府学教学工作的李波厄特时,他拿出了自己的专著——《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粗粗浏览后发现,我们的思想不谋而合,觉得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让中国人了解美国人如何在反思冷战以及冷战胜利对世界的影响,本身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分析的一种结合。

反思过去 把握现在

反思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为了和苏联对抗,美国在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对外军事援助和军事行动、发动政治攻势和情报战等领域花了大笔的金钱,这些都是看得见的代价;但是,美国付出的代价还有更多的无形资产。《五十年伤痕》一书重点研究的就是冷战给美国带来了什么后果,也就是美国为冷战胜利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本书通篇围绕着一条主线: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为了意识形态的对抗,为了保护幻想中的国家安全,美国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表现出临时性和低能的特点,不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也造成了很多难以挽回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社会、文化、教育以及对外形象都受到了深远而消极的影响。

冷战导致美国政治经济军事肌体的巨型化。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美国 and 西方国家都一直在担心“共产主义的扩张”,尤其担心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时,美国已经站在战车上下不来了。为了全方位对付苏联威胁,美国开始建设大政府,即建设大工程和进行大投入,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时期,结果造成了“行政权力的扩张”。这种权力扩张直接带来的是政府组织的严密化和秘密化,进而造成军界与企业界、学术界相互利用和勾结,国有资金以“国家安全”名义大量流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私人腰包。

冷战为美国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乘机扩大自己手中的权力创造了条件。对内,它们以维护国家忠诚为由,对联邦雇员采取诸如测谎检查等措施,以一些莫须有罪名对持不同政见的左翼人士进行监听或抓捕,并以国家机密为幌子掩盖它们违反人权的恶劣做法;对外,只要有助于反苏,中情局就出钱扶植或者怂恿一些代理人国家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人物发动军

事政变和反叛,在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造成了社会动乱和大量平民伤亡。更令美国人感到气愤的是,在一些违反人权和不计后果的对外干涉事件曝光以后,它们却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对国会的调查进行抵制。

冷战导致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怀疑。除了麦卡锡主义和“水门事件”这样的国内政治因素外,在核试验及其放射性尘埃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环境破坏调查问题上,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以试验数据保密为由百般掩盖事实真相,不给普通大众一个说法,政府甚至还在冷战结束后给受害者打白条。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加上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滥用资金和权力,政府的诚信和形象受到了沉重打击,以至于作者担心这种公信力的削弱至今还在影响美国社会的凝聚力。

作者对美国冷战得失的评估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也认为冷战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无论如何,在他看来,冷战加强了美国的政策风格:“临时抱佛脚、棋差一招、粗心大意、在胜利到来的最后一分钟才突然打起精神。”正是这种风格使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不时出现失误,过于夸大军事安全威胁,既浪费了资源、金钱和精力,又阻滞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是作者非常担心“后9·11时代”的美国重蹈覆辙的原因。问题是美国政府能否像他一样反思过去,把握好美国的未来!

中美合作源远流长

尽管冷战期间危机四伏,但中美两国最终还是化险为夷,并为冷战的结束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中美两国的战略合作,冷战恐怕难以结束,至少不会那样出人意料地结束。研究美国,离不开对冷战历史的研究;研究中美关系,更离不开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五十年伤痕》尽管不是一部研究中美关系的专著,但它提供的研究素材和成果也许为我们研究美国、中美关系甚至中国本身都有

所帮助。

中美合作有着历史渊源。中美两国在二战时期就曾是联合对抗法西斯的盟友,诚如作者所说,“在二战结束时中国被看作是美国的盟友,美国不顾英国的反对支持中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尽管两国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冷战早期阶段有过直接的对抗,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冷战中期阶段却有着太多合作的理由,两国事实上再次成为对抗共同威胁的战略盟友。“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与了解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于1945年以来在国际关系背景下如何交往同样重要”。我们不能不推崇这种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中美两国合作的历史渊源中,我们才可能找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合作方向,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美国角度找出苏联解体和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内在根源。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两国的合作势头并没有因为某些结构性因素而发生根本的转变。20年来,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都在蒸蒸日上,尽管充满竞争,但同时也充满进步和创新。研究21世纪的美国及其对外政策,我们需要了解冷战对其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在“安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在“后9·11时代”是否会重新发生作者所说的冷战错误;由于政治欺骗而导致公信力削弱、外交政策盲目而短视,等等。但作者本人并没有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失去信心,他认为“美国或者中国都没有倒退,企业精神、经济活力,甚至更加乐于融入世界贸易和信息革命的愿望都在推动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向前发展。除了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外,还有很多东西在引导着它们”。在我看来,面临21世纪出现的新威胁和新机遇,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合作的理由并不比冷战时期少。

中美合作是新世纪应对国际安全新问题和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的需要。作者认为,美国在“后9·11时代”的安全环境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自杀性恐怖袭击方式在世界历史上很早就有,“‘9·11’暴行并不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恰恰相反,它可以被看作‘全球化’的黑暗一面”。全球化放大了恐怖主义的影响力,也再次

激发起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心理障碍,结果美国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了军事建设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作者所言,“技术和科学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工业、医药、学科领域的革命进程”。因此,这次恐怖暴行并没有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溃,“更没有影响到新世纪最大的世界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全面发展”。这是世界发展大势,反其道而行之只会损人不利己。

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勾画了21世纪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背景:一方面,中美两国面临着新科技带来的经济创新机遇和建立新型经贸合作关系的新机遇;另一方面,两国也面临着一种共同的新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废墟,并与中东无休止的危机融合在了一起。中美两国存在着长期和良性的竞争关系,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中美两国需要学会合作应对国际安全新问题,这样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健康的东西方竞争,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这种竞争值得欢迎”。我们和作者一样对新世纪的中美关系有着美好的期待。

注重取舍 学会扬弃

《五十年伤痕》是新世纪国际反恐历史背景下美国精英人士全方位反思冷战得失的一本难得的著作,此书之所以一度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归根结底在于它所具备的历史批判精神以及对现实政策的督促精神。由于历史不同、国情不同、世情不同、实力不同,以及个人学识背景不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学会扬弃非常关键。

本书内容浩大而不失有序性,涉及美国历史、美国政治经济、美国社会发展、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美国社会发展与政治思潮、美国电影艺术、美国文学等,但一条反思冷战后果的主线贯穿全文;批评尖锐而不失客观性,涉及对美国中情局和其他政府机构争权夺利和欺骗行为,也涉及学术界追名逐利的浮躁气氛等等,但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和看法值得商榷,比如在

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动机、第三世界发生动荡的根源、苏联解体的原因以及意识形态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是否发挥作用等方面都存在争议。当然,这些也正是我们需要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和相互促进的地方。

鉴于本书明显的跨学科性,尽管中文翻译的难度相当大,但译者郭学堂、潘忠岐等以扎实的学术功底、精炼的语言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准确而通畅地翻译出了本书的全貌,并使中国读者能够客观地感受到作者的写作动机和精神,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冷战给美国留下了50年的伤痕,但难以否认的是,这些伤痕不仅仅出现在美国身上,这个世界也因为美苏冷战而伤痕累累,至今未能痊愈,个别地方还有瘀化的可能。我们关注这些潜在的危险,也是在关注世界的发展与和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倪世雄

2007年11月11日

目 录

1 中文版序言(一)

1 中文版序言(二)

1 导言

11 第一章 1945年：峰顶浪尖

第一部分

33 第二章 回到未来(1946—1950)

109 第三章 习惯成自然(1950—1953)

179 第四章 绝非如此简单(1953—1956)

248 第五章 适应漫漫旅程(1956—1961)

第二部分

323 第六章 责任与荣誉(1961—1963)

404 第七章 重任在肩(1964—1969)

477 第八章 战争阴霾(1969—1975)

559 第九章 波谷(1975—1981)

第三部分

617 第十章 重创(1981—1985)

675 第十一章 分崩离析(1985—1989)

743 第十二章 意外结局(1989—)